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六十六期 2007年6月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No. 66, June 2007

創傷、博物館與集體記憶之建構*

陳佳利

Trauma, Museums and the Forma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by

Chia-Li Chen

關鍵詞：創傷、集體記憶、猶太浩劫紀念館、台北二二八紀念館

Keywords: Trauma, Collective Memory, the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the Taipei 228 Memorial Museum

* 本研究獲國科會計劃編號 NSC 94-2411-H-026-004-之補助，並於2006年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所主辦之「製作博物館」學術研討會中宣讀，惠承大會主辦人王嵩山教授及評論人馬彥彬教授提供寶貴意見，復蒙本刊兩位匿名評審給予肯定與建議，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06年8月16日；通過日期：2006年11月28日

Received: August 16, 2006; in revised form: November 28, 2006

通訊地址：台北市北投學園路1號

服務單位：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

email: chiali21@hotmail.com

摘要

作為記憶保存之機構，博物館透過選擇與展示再現，有意識地建構社會之集體記憶，進而書寫族群與國家的歷史，並建構想像的共同體。其中，紀錄國家民族過去所共同經歷創傷之紀念型博物館，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紀念型博物館一方面經由重新建構與詮釋事件或災難本身，使得創傷經驗之再經驗與重複討論成為可能，另一方面，因博物館的機構性質及其所建構的公共空間，也成為提供民眾反省歷史、凝聚民族情感與建構認同與集體記憶之場域。因此世界各國紛紛建立各種紀念型博物館，提供民眾一個緬懷、悲憤進而建構集體記憶的場所。然而，在交織著各種災難、爭戰與痛苦的人類歷史長河中，究竟哪些災難與創傷記憶會成為博物館永久紀念的對象？而國家權力及不同的族群團體又是如何介入、選擇並透過博物館來建構集體記憶？而觀眾又是如何經由博物館的再現機制來理解、詮釋並且回應歷史的創傷與悲劇？這些都是本研究想要探討的問題。

本文擬以創傷、博物館與集體記憶之建構為研究主題，以文獻回顧的方法，整理討論災難紀念型博物館之類型與形成背景，並以國外猶太浩劫紀念館為例，探討博物館與集體記憶及認同之建構關係。此外，本文並將以台北二二八紀念館為個案，分析其中政治、認同與創傷記憶是如何在這個場域中糾葛、展示與型塑。

Abstract

As an institution of collecting and preserving memories, the museum not only constructs the social collective memory, inscribes the history of the nation but also constructs the imagined community by its selection and representation. Among all types of museums, the memorial museum which documents the traumatic experiences of the n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The memorial museum on the one hand makes it possible to re-experience and discuss repeatedly the traumatic experiences by its reconstr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incident or disaster itself. On the other hand, the public space of the memorial museum also provides a field for visitors to reflect history, build national consensus and construct identity and collective memory. During the long history full of disasters, wars and traumas, what kind of disasters and traumatic memories will be selected and memorized by the museum? How does the power of nation and different ethnical and interest groups get involved and select memories to be presented by the museum? Also how do visitors understand, interpret, and respond to the historical tragedies and traumas through the mechanism of representation of the museum? These are the questions that this paper intends to explore.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uma, museu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It will present the types and context of the memorial museums and apply the holocaust museum as an example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useum and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 In addition, the Taipei 228 Memorial Museum will be applied as a case study to analyze how politics, identity and traumatic memories are intertwined, displayed and constructed in this particular field.

前 言

博物館在本質上，是透過有形的物質與展示，紀錄並保存地方與民眾的記憶。王明珂（1993）指出：「個人與社會都常藉著具形的或可見的物件或文字，圖案以喚起記憶，因此參觀博物館，翻看家庭照片，讀一本歷史書，都可以當作是喚起或更新集體記憶的活動」（10）。而參觀博物館往往也喚起許多屬於個人、社區及國家的記憶。研究指出人們是有選擇性地記憶與遺忘，而其所集體記憶與保存的內容往往是符合現今社會之所需而架構出來的（王明珂 1993, Halbwachs 1980）。博物館透過機構的力量，選擇性地為整個社會及民眾保存記憶；因此，學者指出博物館與民族國家之集體記憶是緊緊扣連的（Zolberg 1996）。雖然相關文獻指出博物館在型塑集體記憶的重要性，然而分析處理國家集體創傷之災難性或紀念性博物館如何重構集體創傷經驗，且觀眾參觀的內省經驗為何，及這樣的創傷經驗如何透過博物館展示，成為集體記憶之一部分的相關研究則很少見。本文擬透過相關理論及國外案例之整理，並以台北二二八紀念館為研究個案，整理觀眾之留言條，分析創傷、博物館與集體記憶與認同之建構。

創傷的形成

心理學家 McNally（2003）指出創傷（trauma）的定義為：一個客觀的事件（an objectively defined event）、個人對其主觀之意義詮釋（the person's subjective interpretation of its meaning）及個人對其情緒性之反應（the person's emotional reaction to it）（78）。因此，構成創傷主要是由事件及個人對其詮釋與反應所構成的。因此，沈志中（2004）運用精神分析理論，指出事件構成創傷的三個時間：

一、為事件發生時，因為其無預期性，因此無法為經驗主體所掌握及了解，而產生了創傷的第一時間。

二、將事件予以標記或符號，使其得以重新建構與詮釋，而這個重新詮釋建構的工程則構成創傷的第二時間。

三、因為事件之無可理解與其所帶來的焦慮，因此需要不斷地重複討論與詮釋，形成了創傷的一再重複，成為創傷的第三時間。

沈志中（2004）進一步討論分析道：「創傷並非在於意外事件所造成的身體或精神傷害，而在於主體對於到來的事件一無所知、毫無準備。是這種毫無準備的狀態，賦予事件恐怖的性質。因此創傷的構成必然同時包含 體驗- 詮釋 -重複 這三個時間」（47）。心理學者也整理拉岡（Lacan）的理論，指出：「創傷意味著某種心理能量固著（fixation）或阻塞（blockage）的狀態。固著總是和某物尚未象徵化（symbolized）有關，而語言的替換與取代功能，正是固著狀態的對反面」（陳淑惠、林耀盛、洪福建 & 曾旭民 2000：37-8）。由以上討論可以得之，創傷之形成並不在於事件本身，而在於之後主體對其回憶與詮釋；或者說，是主體對事件之回憶與難以詮釋，造成「一種尋求意義賦予的懸而未決樣態」（陳淑惠、林耀盛、洪福建 & 曾旭民 2000：38）。而造成意義懸而未決樣態的原因，或是因為事件帶給個人之驚嚇過於巨大而無法言說，或是事件之突發性而難以理解；復因來自社會環境的壓力而加強了個人之壓抑，使得對於事件之詮釋，難以有固定之意義而處於懸而未決的樣態，導致創傷第二與第三時間之不斷循環與重複。事件所帶來的創傷小則終身折磨當事人之身心，大則成為國家民族之集體創傷記憶，不斷地咀嚼、衝擊、考驗國家民族的未來。

然而個人又是如何回憶創傷的呢？換句話說，創傷是如何經由回憶的方式所引發呢？心理學家經由臨床實驗得知，創傷由以下幾種記憶方式進行之：侵入性之回憶（intrusive recollections），夢魘（nightmares），倒敘回憶片段（flashbacks），及對於引發創傷回憶物之身心理反應（psychophysiological reactivity to reminders of the event）（McNally 2003：105）。這些創傷回憶活動指的多半是屬於個人創傷

經驗及其所引發的回憶活動，如性侵害及家暴等經驗，出現的方式如突然出現在生活中關於事件的回憶片段，或不斷出現在個人之夢境中，造成創傷場景不斷反覆重返的徵狀。這樣反覆重複出現的夢境，佛洛伊德視為固著於創傷的症狀，而這樣的強制重複則是為了透過遲來的控制，企圖改寫突然遭受創傷的那種毫無準備的狀態。然而，即便如此，這遲來的控制卻總是徒勞無功。因此，創傷總是無所不在；而且成為型構主體之必經過程（張小虹 2002）。

如果創傷為型構主體之重要歷程，那麼，當事件規模大到影響整個社區、城市或國家時，其所形成之創傷回憶，則不再限於個人之回憶活動，而成為集體性之回憶，且對國家民族之型塑與認同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汪文聖（1999）指出：「……人們對過去社會記憶的選擇、重組與重建乃針對被遺忘的歷史事件，它們也常為對社會上某人或某團體的創傷，而為社會中有權力的團體所曾經壓抑或重新喚回。這種現象猶如對前面個人心理創傷問題之宏觀化……」（83）。如果社會國家所經歷之事件及災難，形成所謂宏觀之心理創傷，那麼不斷地重複回返及遲來的控制，如透過各種保存科技來予以再現、詮釋與建構創傷場景，則成為必要且必然之現象。Connerton（2000）指出回憶除了透過日常生活中的各種活動與實踐之外，也透過各種現代技術，如攝影、錄音、錄影、印刷等技術，來印刻在我們身上，使之成為共同的記憶。因此，集體創傷記憶之構成，除了親身經驗與詮釋外，更多時候是透過種種再現機制與儀式活動，得以再建構與傳承，而成為國家民族之集體記憶。

然而，如果集體之創傷如同個人之創傷，那麼依照精神分析學說所指出的，對於曾經親身經歷創傷事件之個人，所有的詮釋與建構都只是構成創傷的第二及第三時間，既無法改變創傷之事實，而遲來的控制也多是徒勞的。雖然如此，佛洛伊德認為透過回憶與詮釋，返回創傷的原初場景，仍是治療精神官能症的方法之一。而認知治療學派則採取更為積極的態度來協助受苦者渡過創傷經歷，以面對人生。

陳淑惠（2000）等人整理 Tedeschi 與 Calboun 之論點，主張透過對災難事件之詮釋與理解，可以達到「重新裱框經驗之認知結構（reframing）」的效果，且協助受苦者以正面、有利個人福祉的思考角度，來賦予創傷事件可管理性（manageability）、可理解性（comprehensibility）與具意義性（meaningfulness），進而建立自尊且積極的人生觀。若以這個觀點來思考相關博物館存在價值核心之一，除了提供創傷經歷的三個時間外（體驗－詮釋－重複），博物館也同時提供觀眾一個可以重新裱框經驗的認知結構，並協助建立具意義且可理解之史觀。

災難事件之擦拭與保存

究竟博物館是透過怎樣的機制來保存及擦拭/建構創傷記憶？在分析博物館的敘事與觀眾反應前，本文擬先從人類社會如何透過物質文化來保存或消滅災難所帶來之創傷記憶，進而論證災難博物館發展之脈絡與機制。

首先，眾所周知地，扮演著保存人類文明與文化的博物館，事實上是無法保存所有的記憶與物件。Urry（1996）分析指出這些保存記憶之科技，其所扮演的角色不只在於記憶之保存而已，而是透過篩選的過程，選擇了部分記憶予以保存，同時也因此選擇其它部分予以遺忘。因此，記憶與遺忘為一體兩面，而且「遺忘的過程與記憶的過程，同樣都是社會性地建構」（50）。然而，什麼樣的記憶會被選擇並透過怎樣的方法保留下來？而怎樣的事件與災難會被刻意地抹煞及去除痕跡？若從日常生活的角度，可以發現人類的本性是傾向於保留快樂的記憶而抹去悲痛的傷痕。因此，我們拍攝並且保留大量的照片，多是紀念一些快樂的場合，如生日、結婚典禮、旅遊等快樂的場合，而較少去紀錄或者拍攝諸如災難、疾病及死亡的場景。其原因無它，我們均喜歡回憶快樂而非痛苦的時光；因此，如果有令人傷痛的事件發

生，爲了避免觸景傷情，相關的物件或場景，我們也會傾向將其銷燬、不留痕跡。

Foote (1988) 分析人類社會是如何透過博物館及紀念碑等機制與型式，來保留其所欲記憶之傷痛，並且抹滅其所不願再回憶的事件。以災難事件爲例，他分析討論究竟人們如何記憶或遺忘災難事件，往往取決於形成災難的原因。如一般社會對於精神失常或強盜等犯案之災難現場，往往極力加以抹滅，以撫平傷痛。如 1966 年一名精神病患掃射德州大學生，發生災難所在之建築物，即於事件發生後，重新油漆粉刷以抹去其傷痛之痕跡。而面對政治事件所造成的歷史傷痕，往往最難癒合；對於其記憶之保存或抹滅，則涉及複雜的政治角力及不同族群與國家之不同記憶方式。以二次大戰德國納粹政府對猶太人屠殺之暴行爲例，Foote (1988) 指出德國人民是如何極力地想忘掉納粹的政權及其暴行，因此，即使柏林地區有許建築物即爲過去納粹政權發號施令的地方；然而，這些建築物與歷史事件之關連均未被標示或積極地保存。而 Koonz (1994) 也指出即使在東德地區所保留的前納粹集中營，也被前東德共產政府用來宣揚反法西斯之用，至於納粹在此集中營中如何迫害猶太人及其他異議份子，卻很少提及。然而，相對地，許多德國境外的集中營及相關的歷史建築卻被完整的保留，如位於波蘭著名的 Auschwitz 集中營及荷蘭阿姆斯特丹的安妮之家 (Anne Frank House)；這些在德國境內不太願意被記起的回憶，於這些受害的國家內，卻被完整的保留且廣爲人知，以保留記憶來聲討納粹政府之不義，及撫慰千萬受傷的倖存者與其家屬。

一般而言，很少會有人刻意地將這些極度傷痛且不愉快的回憶保留下來。除了個人之災難事件外，人類社會對於大型災難事件也是小心翼翼地處理。推究其原因，固然與人類社會不喜留下與創傷記憶相關之地景痕跡有關，但是，如果是屬於施暴之醜陋過去，則抹滅連結國家民族之不光榮記憶，所作的努力會更加顯明。因此，這也不難理解爲何災難紀念型博物館之出現較爲晚近，而且牽涉到事件範疇內不

同主體及族群之詮釋、衝突與複雜之權力再現問題。以下將簡單回顧災難紀念之形式與種類、討論其成立之意義與社會脈絡並分析博物館在保存、建構及抹擦災難記憶時所扮演的角色。

災難紀念博物館之意義與建構

如上述，災難紀念博物館不但再建構一個充滿悲傷之記憶場景，同時也可能是充滿利益與政治的衝突回憶空間，往往每個團體因其自身之背景與經歷之不同，而對同一歷史事件有著不同的史觀、詮釋角度與回憶。既然戰爭或災難紀念型博物館構成了創傷之第二與第三時間，且容易成為各族群或利益團體間衝突之場域，那麼我們又為何需要建立災難型紀念博物館？而其所依據的原因及理由為何？Huysen（1993）指出回憶是連接人類過去的重要活動，而我們如何回憶也型塑著我們的現在。Nytagodien 及 Neal（2004）進一步分析如果社會選擇性地遺忘其醜陋的過去，如德國對於其納粹時代的暴行予以忽視，其未受檢視的各種偏狹之種族主義與意識形態將潛伏於其社會之中，而導致之後的種種社會問題。因此，他們認為透過對歷史的省思，建立一個以道德社群（moral community）為基礎的社會是很重要的。張譽騰（2003）在討論設立 921 地震教育園區之必要時，也引用法國思想家赫南的話指出：「在人民的共同記憶中，災難與傷痛比享樂或是光榮更重要，也更有價值，因為它更能緊密的結合民眾，喚起患難與共的情感，進而使人民凝聚成爲一個堅實的共同體」（146）。因此不難理解為何世界各國紛紛建立各種紀念型博物館。如美國華盛頓的猶太浩劫紀念館（the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荷蘭的安法蘭克之家、日本的廣島原爆和平紀念博物館及英國皇家戰爭博物館（the Imperial War Museum）等。因為博物館一方面可以透過展示與對歷史事件之反省，扮演促進道德社群形成的機制；而另一方面，也可以成爲連結國家民族之過去與型塑民眾集體記憶、凝聚生命

共同體之場域。

究竟一個社會是如何選擇其所願意及不願意記憶之創傷經驗，而其淘選的機制為何？綜合學者及研究者之分析與觀察，本文歸納出創傷記憶被保存之種類及其機制如以下幾點：

一、作為證據或正義未得伸張者

有許多殺人現場因為兇案遲遲無法破案，而必須保留現場、痕跡及其相關物證，以作為未來案情釐清之證據；也有受難家屬因為正義遲遲未得以伸張，而刻意保留災難相關現場，以作為控訴並且發揮提醒世人之功用。

二、感念善行、足以為社會表彰者

有一些社會傷痛事件，因為牽涉的範圍並不廣泛且涉及的並非社會顯赫之人，在當時雖然為報章雜誌所報導，然而卻隨著時間的消逝而逐漸為世人所淡忘；而這樣的社會小事件中不乏令人感佩之善行，而被立碑紀念的，如位於台北市立美術館第二公園一角之紀念碑，即是紀念為了營救被虎頭蜂攻擊之學生而犧牲自己生命的老師。

三、加強社會之凝聚力

如果說引起人們傷痛之創傷記憶，有什麼正面性之力量，那麼其中最明顯之意義即在於加強社會之凝聚力。社會群體需要透過共同的經驗與回憶來聯繫彼此，而透過共同經歷災難並且克服之，更能夠產生生死與共之共同體的感受，如英國境內即有許多戰爭紀念博物館，多是為了紀念一、二次世界大戰所設立的：透過對兩次大戰的回顧與認識，讓英國民眾一方面可以回憶起過去全國上下一心、共體時艱之悲歡歲月；並可以透過歷史的回顧重溫其對兩次大戰之貢獻。

四、為社會上多數人所共同經歷或關心者

多數的災難記憶如天災人禍等，當事人未免觸景傷情，往往擦拭並且消滅相關之文物。然而，如果事件影響範圍寬廣，為社會上多數

人所共同經歷或關心者，那麼這樣的災難現場往往會有所保留，以供憑弔並且激起共同的回憶，如以霧峰九二一地震遺址所規劃興建的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等。

五、為國家歷史之教訓者

近代許多戰爭紀念型博物館，其成立原因除了如前述之加強社會凝聚力及緬懷過去光榮歷史外，也有一些博物館成立之目的是為了記取戰爭慘痛的教訓並且警告世人不要再重蹈覆轍，如廣島的原爆紀念館即為一例。

六、符合現存之政治權力與利益者

除了上述諸多不同原因外，許多一開始被視為危險而被壓抑或遺忘之創傷記憶，往往隨著政權之更換，而得以重新挖掘並且保存。在臺灣，最著名的事例為與二二八事件相關之記憶與檔案，隨著解嚴後政治生態與環境之丕變，使得一度極受壓抑之創傷記憶，不但得以重新挖掘出來，更透過各地方紀念碑及博物館的設立，使之成為社會共同之集體記憶。

作為記憶保存機構之博物館，透過選擇與展示再現，博物館有意識地透過機構的力量，來建構社會之集體記憶，進而書寫族群與國家的歷史，成為建構想像共同體之重要來源（Zolberg 1996）。災難紀念型博物館所扮演的角色，一方面經由重新建構與詮釋事件或災難本身，使的創傷經驗之重複討論與再經驗成為可能；另一方面，因博物館的集體性質及其提供的敘事與參觀經驗，民眾可以藉由對歷史悲劇及災難之反思與感懷，而凝聚民族情感及生命共同體之意識。

就災難的性質而言，災難紀念型博物館之內容可以粗分為天災及人禍：前者以地震博物館為主，如日本淡路島地震博物館及台灣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而後者則以戰爭紀念博物館為主，其中又以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相關之紀念館為數最多，如英國之皇家戰爭博物館及華盛頓猶太浩劫紀念館。在成立目的方面，地震博物館除了提供社會大眾

一憑弔與追思之場所外，更強調教育社會大眾地震相關知識，企圖透過地質學知識之解說，協助參觀民眾對於這突如其來之巨大浩劫，建立可理解之詮釋與意義，進而達到「重新裱框經驗之認知結構（reframing）」的效果，幫助受難家屬以正面的思考角度，來賦予創傷事件可管理性與可理解性。然而戰爭紀念博物館，其目的及功能雖多以記取歷史的教訓為主，但因牽涉的多是交戰之不同政治實體，其詮釋與敘事，也難以如地震博物館般地以看似客觀之科學知識為主要論述；而同一場戰役往往對不同交戰國家及背景之觀眾，其敘事、詮釋及帶給觀眾之經驗也會大相徑庭，甚至充滿著矛盾與衝突；小則影響個人對國家民族歷史之認同，大則引發並延續族群與族群間、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偏見與仇恨。以下以猶太浩劫紀念館為例，分析不同的猶太浩劫紀念館成立之政治背景，並說明其意義如何隨著政治社會變遷而轉變。

誰的猶太浩劫紀念館：創傷、政治與認同

在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各地紛紛建立相關之戰爭紀念博物館，其中又以設立紀念猶太人於二次大戰中遭納粹屠殺之相關紀念碑與博物館，尤其引人注目。除了因其於歐洲各地，乃至英、美等國廣設紀念碑與博物館而引起廣泛的關注外，也因其屠殺規模之大，與遭遇之悲慘而引起世人的共鳴與同情。分析猶太浩劫紀念碑與博物館之類型，可以分為災難遺址之重建及非災難遺址之興建，前者如波蘭境內的 Auschwitz 集中營、德國的 Buchenwald 集中營及荷蘭 Anne Frank 之家；後者則以美國、英國及以色列境內之猶太浩劫紀念碑與博物館為最多，也最為著名。保留災難現場成為紀念館，其地方及場所精神，本身就具有見證與招喚記憶之力量。然而，在非災難發生的英、美或以色列等國興建猶太浩劫紀念館，其決定往往有其政治及經濟上的考量。

以以色列為例，二次大戰後於中東建國的以色列，其國家雖然並非屠殺與災難發生之現場，但爲了凝聚民族情感與愛國意識，自然不會也不能遺忘二次大戰納粹對其民族殘暴之迫害。以色列及波蘭早在二次大戰結束不久後，即開始建立與保存與猶太浩劫相關之文物並設立紀念館。然而，其紀念之意義也隨著時代與環境而有著不同的詮釋意義。Friedländer (1994) 分析整理以色列如何於不同時期及政治氛圍下，思考、詮釋並且定位猶太浩劫對其國家民族之不同意義。以色列早於一九五一年即訂定了猶太浩劫紀念日 (Holocaust Commemoration Day)，並於一九五三年建立了 Yad Vashem 猶太浩劫紀念館，以緬懷於二次大戰中遭納粹迫害犧牲之猶太人。在一九五〇年代初期，以色列將猶太浩劫之意義連結到其宗教傳統中毀滅與救贖的論述中 (catastrophe & redemption)；也就是說，猶太教相信唯有透過毀滅才能帶來救贖。而在這樣的宗教思維下，猶太人在歐洲所遭受慘絕人寰之屠殺，被理解爲因其毀滅而帶來以色列國家之新生。而這樣的詮釋與定義於一九六七年以阿六日戰爭後，被賦予新的詮釋。Friedländer (1994) 指出隨著以色列與鄰近阿拉伯國家之緊張局勢之升高，猶太浩劫意義之轉變如下：首先是將阿拉伯國家對其國家之敵意與納粹對猶太人的不義之舉連結，其次透過猶太浩劫之歷史悲情來強化以色列參與各種爭戰之合理性並加強民族認同。最後，則透過猶太浩劫說明猶太人命運之獨特性與以色列國家之孤立處境，並以此尋求新的救贖 (155)。所以透過紀念碑與博物館之設立，以色列除了於其宗教傳統中提供民眾理解其民族悲劇之詮釋外，也因應不同之國際政治環境，加強國民之憂患意識，並時時刻刻提醒以色列人民沒有國家的民族之可悲。

另一方面，擁有歐陸之外最多猶太浩劫紀念館的美國，其設立背景與意義則與以色列的狀況大不相同。Crysler 和 Kusno (1997) 分析美國猶太浩劫紀念館之形成，指出美國猶太浩劫紀念館之所以直到一九七九才開始規劃並且遲至一九九三年才開放，而並非在二次大戰後

就開始籌建，是與其政治社會背景及國家認同政治息息相關的。而 Novick (1994) 則指出猶太人只佔美國人口之 3%，而美國也不曾被納粹德國佔領或成為屠殺猶太人之發生地，然而卻成為歐陸之外，最積極透過猶太浩劫紀念館之設立來保存相關回憶的國家，是與其國際政治和猶太社群意識之消長變化有著深刻之關係的。他指出一開始美裔猶太人不但願意強調其族群於歐陸之慘痛創傷回憶，反而因此更加強美國公民之認同，甚至於一九四〇年代末期反對紐約市政府興建猶太浩劫紀念館之提議，因為他們不希望呈現或加強猶太族群無助之受難者形象。而二次大戰後的美國政府在積極圍堵共產勢力增長之際，也不希望凸顯德國政府於二次大戰中加害猶太人之角色。這樣的情況一直到六〇年代因美國國內外政治環境之改變才開始產生轉變。

首先，是負責執行猶太屠殺相關政策之納粹高官 Eichmann (Otto Adolf Eichmann) 於以色列之審判與處決引起美國民眾，尤其是美國猶太社群之廣泛注意。其次，一九六七年阿拉伯各國聯合攻打以色列之六日戰爭也引發美國政府及猶太族群之高度危機感，惟恐猶太人亡國流亡的歷史悲劇又再度重演。最後，美國境內大規模之黑人民權運動也使得美國政府企圖透過打猶太牌，來降低社會輿論對黑人議題之重視。而與猶太浩劫相關之意識於一九七〇年代，更因美國電視劇之播放，開始進入“全面興盛”的時代；至此，美裔猶太人將猶太浩劫及以色列經驗成為建構族群認同之重要基礎。Young (1994) 也說明美國境內猶太浩劫紀念館之成立背景，有著錯綜複雜的因素交錯。政治現實考量外，也參雜著美學因素等。如呼應美國境內猶太族群之經濟實力及選票等考量，除了提供受難家屬及美國猶太族群追思的場域外，往往也建構美國民眾對身為解放者角色之認同。

因此，一個國家及社會如何選擇其所欲回憶之歷史創傷，其實是有著複雜之政治考量；而以色列及美國猶太浩劫紀念館之成立，也說明了災難博物館不僅僅提供民眾一個學習歷史與悼念亡者的空間而已，也往往與其政治生態及所欲動員之族群認同有著密不可分的關

係。透過相關紀念館之成立，也更加強了部份歷史經驗成爲民眾重要之集體記憶。然而戰爭創傷集體記憶之型塑，如 Crane (2006) 所言，並非總是統一或合諧之共同記憶，其多義性 (multiplicity) 也使企圖且習慣以單一敘事教育民眾特定版本之歷史的博物館，面臨很大的挑戰。然正因爲其特殊性質與內容，在展覽的過程中，如果牽涉到彼此對立或交戰之不同國家或族群，其展示與詮釋觀點，則會受到多方利益團體不同觀點的影響而有所衝突，成爲充滿衝突與傷痛記憶的場域。首先，對於那些不曾經歷過原初創傷場景之觀眾，透過各種保存與展示技術所經歷之創傷事件，似乎形成一種觀看他人傷痛的體驗之旅，並於其中創造並且建構屬於體驗式之創傷經驗保留；然而，這樣的創傷經驗是經過重重挑選、詮釋與建構的。但是對於那些曾經經歷過災難之目擊者或受難家屬等人，他們的經驗與詮釋則迥異於一般的觀眾了。

Zolberg (1996) 詳細討論一九九四年美國國立航空博物館 (The National Air and Space Museum) 所規劃的關於紀念二次大戰日本原爆五十週年的特展，其所引發的各種衝突。這項計畫原本預定除了展出美國當年空投日本原子彈的那架著名戰鬥機 (Enola Gay) 之外，也將討論原爆所引起的各種政治、社會、道德與環保議題，內容並包括受難家屬的見證及其對冷戰形成之影響等等。然而這項展覽計畫遭受各種團體的質疑，如美國退伍軍人等團體的抗議，他們認爲當初的決定無疑使戰爭提早結束，以減少更多平民百姓之犧牲，因此無法認同展覽對於美軍使用原子彈所帶來的種種負面評價，如開啓冷戰及核武競賽之紀元等 (Crane 2006)。在不同的聲音與壓力下，博物館只好縮減其展覽規模，只展出戰鬥機及一些影片與照片，而將原本規劃討論的各種議題刪除而不予展出。對日本而言，原爆不但迫使他們投降，結束其稱霸亞洲的夢想，而原爆巨大的威力，也帶給日本國民難以想像的恐怖創傷。然而美國對廣島與長崎所投下的這兩顆原子彈，對同盟國成員及受日本佔領之亞洲各國而言，無疑提早結束了二次世界大

戰，帶來渴望已久的和平。然而對全世界而言，原爆強大而慘絕人寰之威力，對世界和平已然悄悄投下不可抹滅之陰影。然而這樣不同之經驗與觀點果真無法交流？博物館只能持續地成爲各種相互衝突之創傷記憶迴盪之場域？博物館如何透過展示，呈現出原爆或戰爭對不同的國家、族群乃至人類社會之不同經驗與影響，其相互衝突，乃至交戰各國不同背景的觀眾，如何於其中相互溝通，進而理解，達到所謂互爲主體性之經驗交流，而不只是各自持續抱持己見與固守立場。這些則考驗、挑戰著博物館之專業與胸襟，並且構成未來戰爭及創傷紀念相關博物館實踐的重大考驗。其中，博物館展示策略與敘事方法，直接影響著觀眾之博物館經驗與詮釋。以下將舉例分析戰爭紀念館之展示策略，討論其所欲傳達給觀眾的訊息與經驗，藉此進一步探索、思考達到互爲主體性之可能性與方法。

戰爭紀念博物館之展示策略

首先，就展示策略而言，紀錄人禍之災難紀念博物館，如猶太浩劫紀念館及日本廣島原爆紀念館，多半以歷史敘事爲主軸，搭配照片、文物及模擬歷史場景之模型爲輔，來架構並且鋪陳整個事件發生之來龍去脈。因爲歷史之發生已然無法再重現或還原，所以爲了加強其敘事之真實性及可信度，災難紀念博物館運用大量的照片來佐證展示說明牌所架構之歷史敘事。這些照片以新聞及紀錄報導攝影爲主，透過攝影師的捕捉，照片將曾經存在、發生過的某個場景及人物，透過底片感光之特質，框景、定格、成爲我們凝視之對象。透過這些栩栩如生的照片，使得歷史事件之發生更顯得真實，而許多受害者之照片，也加強對戰爭不義之控訴。然而照片真的如實地、不帶偏見地再現歷史場景嗎？如同 Sontag（陳耀成譯 2004）所言，照片雖然以其寫真能力而於新聞報導中獲得特殊的地位，然而所有的照片，就如同其它的影像媒材，都是等待文字語言加以詮釋來架構其論述。換句話

說，同樣的一張關於受難兒童的照片，不同交戰雙方，可利用作為對敵方暴行之指控；而同樣的照片與文物，也可以為不同的團體，作出截然不同的詮釋與展示。

其次，戰爭紀念博物館在敘事方面，運用著多重策略，以達到不同層次認同之建構。以猶太浩劫紀念館為例，其敘事手法一方面將猶太人慘遭浩劫之歷史悲劇鑲嵌在國家及世界歷史之脈絡中，另一方面則透過受難者的眼睛，來傳達並引發觀眾對戰爭所帶來之痛苦與不義的感受。Crysler 和 Kusno (1997) 分析美國猶太浩劫紀念館的敘事策略指出，透過展場之設計和敘事，博物館嘗試使觀眾以兩個角度來認同展示：一為受難者的角度；另一為見證者的角度。前者透過發給每位觀眾一本參觀護照，裡面紀錄一曾遭納粹政權迫害的真人真事，來引發觀眾的認同；後者則透過許多美國大兵初到納粹集中營時所拍攝的影像，使觀眾採取見證者之角度來觀察。透過這兩種敘事策略，其最終目的，則在於引起美國人以身為解放納粹政權之自由民主、多元文化之國家公民為榮。

戰爭紀念博物館在引發觀眾情緒與深沉經驗方面，Landsberg (1997) 以美國猶太浩劫紀念館為例，分析其展示設計雖然企圖引發觀眾有一種身入其境之感受，然其所引發的經驗，卻與感同身受、關切，並且想改變其悲慘命運之同情感 (sympathy) 有所不同；在這裡，觀眾所引發的是感受、經驗不同命運之移情作用 (empathy)，而這樣的情緒與感受卻無法轉化成為積極的行動與力量。Sontag (陳耀成譯 2004) 對於觀看戰爭照片所引發的各種矛盾及憐憫，提供了批判性的觀點。她指出：「我們感到憐憫，指的是我們感到自己不是釀造災痛者的幫兇。我們的憐憫宣告了我們的無辜清白，以及我們宛如真切的無能無力感」(117)。她認為與其感到憐憫，不如反省為何同在一張地圖上，我們的命運是如此的不同，而我們的優裕是可以導致其他人的貧窮與痛苦。

展示批判與觀眾研究

透過博物館的展示手法與敘事分析，可以了解博物館所企圖傳遞給觀眾的訊息及其所欲引發之感受與認同。然而觀眾是否完全如博物館所預想般地經驗與感受？正如美國航空博物館原爆特展的案例顯示，觀眾的背景、經驗及社會、政治立場等，均影響著參觀博物館的經驗，以及對此特殊主題之感受。除了議題的敏感性外，許多災難紀念博物館容易引起觀眾之創傷回憶，而產生許多複雜而深沉的內省經驗。回顧博物館觀眾研究之趨勢，觀眾經驗之研究從早期行為主義式的研究，研究觀眾參觀博物館的行為模式，到近年來越來越重視觀眾的認知方式與學習成效之研究，顯示出觀眾研究的趨勢已有明顯地從外在行為的探討到內在經驗研究之改變（Hein 1998）。觀眾到底在博物館中有何經驗與感受？他們又是如何詮釋展品的？爲了回答這些問題，有越來越多的學者採用質性研究的方法來深入了解觀眾的博物館經驗（Hooper-Greenhill 2000, 2001）。陳佳利（Chen 2003a）於台灣五個地方及歷史博物館進行研究並訪談二十五位經常到訪之地方觀眾，對於觀眾如何於博物館中回憶及其回憶內容提供了初步的了解與分析。她的分析指出在不同性質的博物館中，其回憶內容也有顯著的不同，尤其在紀錄及展示充滿著悲傷與災難事件的博物館環境中，觀眾的回憶則明顯地夾雜著個人悲傷的回憶與集體的創痛，如於台北二二八紀念館進行的研究訪談發現，受訪者表達出對歷史事件之重構、歷史悲劇之集體創傷回憶與對青春流逝之回憶等。

上述質性訪談研究雖然提供地方觀眾在博物館中回憶的方式與內容初探，然而，卻有著樣本數不足、無法了解一般觀眾經驗與感想之缺點。但是在議題敏感之博物館，如美國猶太浩劫紀念館、台北二二八紀念館或英國宗教博物館，欲進行兼具深度與較大規模之質性訪談，除了在取得受訪者信任等技術上十分困難外，也很難讓受訪者在

不受研究者影響的情況下，毫無顧忌地表露自身的反應與詮釋，而量化的問卷調查又有事先限定問題與答案的缺點。因此，也有學者在博物館內進行觀眾研究時，採取觀眾留言簿分析之研究方法(Hein 1998, MacDonald 2005)，優點為觀眾是在自由且自主的環境下，留下個人主觀詮釋及心得，而不需顧慮研究者或館方的意見或想法，這樣的內容雖然多半十分簡短，然而卻相當直接而真實，且具有較大樣本數之優點。但是缺點則是除非設計特別的格式，否則無法得知留言觀眾的背景，因此 MacDonald (2005) 認為可以透過分類分析觀眾留言內容及數目比例，或合併其他的研究方來彌補上述缺點。

因此，本研究以案例研究的方式，選擇展示影響台灣民眾深遠事件之博物館——台北二二八紀念館為研究分析對象，探討博物館與創傷經驗及集體記憶之型塑與關係。選擇台北二二八紀念館除了其規模與影響力外，更重要的是該館設計有觀眾留言專區，提供觀眾留言之用。本文除了分析二二八紀念博物館建構之社會脈絡及其展示策略外，也擬運用觀眾留言條之分析，作為觀眾研究之方式，探知一般民眾之反應與經驗類型。

紀念與建構二二八

在分析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前，首先，有必要先回顧台灣二二八相關紀念館成立之背景、目的與內容。

台灣二二八相關紀念館之成立，與一九八七年解嚴後的台灣政治生態息息相關。在這一股政治民主化與本土化的風潮下，九〇年代初期對於平反二二八事件之聲浪達到最高點，在民眾要求公開相關檔案並要求國民黨政府公開道歉等訴求外，對於二二八事件之追思與悼念，也逐漸透過各種公開的儀式進行，如二二八紀念音樂會及各種表演與遊行等。此外，如何透過有形文化資產之設立，讓二二八事件能夠獲得更為永恆之紀念形式，也成為相關人士十分關切並且積極推動

的工作。

在這一波紀念二二八事件的潮流下，最先進行的、也較為容易的是設立紀念碑。自從一九八九年八月，嘉義市郊豎立起台灣第一座二二八紀念碑至今，高雄、台南、台北都陸續蓋了二二八紀念碑。根據估計，台灣全省目前至少有七座紀念碑，其中嘉義市與高雄縣市就都各有兩座（謝金蓉 1997）。相較而言，紀念館之設立則因涉及人力、物力相對地較為龐大，因此設立的年代也較為晚近。最早設立的紀念館為一九九六的嘉義二二八紀念館，這固然因為嘉義市為二二八事件發生之重要場所，也與嘉義市之地方政治生態及市長張文英之大力支持相關。其設立目的在於：「落實鄉土教育，讓代代子孫記取教訓，效法前人精神，尊重生命、捍衛公義與和平」。其次為二二八事件五十周年後，於一九九七年開放，由陳水扁擔任台北市長時整修位於台北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的前台北放送局，改建而成的台北二二八紀念館。設立於首都的台北二二八紀念館，除了呈現並紀錄二二八事件相關文獻及文物外，也成為每年二二八紀念周年時，舉辦各種追悼活動，甚至各項抗爭遊行的重要場所；因此成為各種政治力與意識型態角力、發聲的地點。以下將台灣截止二〇〇六年底與二二八相關之紀念館及常設展，其設立年代、成立宗旨及展覽內容列表如下：

表一 台灣二二八紀念館一覽表

	台北二二八紀念館	嘉義二二八紀念館	阮朝日二二八紀念館	「二二八事件在高雄」常設展
地點	台北	嘉義	屏東	高雄歷史博物館
成立時間	1997	1996	2002	1999 推出，2004 更新
成立宗旨	公佈史料，安慰受難者家屬，讓台灣人民走出二二八陰影，將苦難提升為進步或再創造的力量，使台灣社會重建健康心靈，愛和寬恕，得以成為和諧生活的命運共同體，並冀能促進族群的共榮共和，社會、文化的健全發展。	落實鄉土教育，讓代代子孫記取教訓，效法前人精神，尊重生命、捍衛公義與和平。	讓台灣的新舊住民認清二二八這個歷史課題。	讓民眾對二二八事件有一真實而深入的了解，重塑社會的公理正義，促進族群間共同的歷史認知、情感和諧及國家團結。

(續表一)

展覽內容	二二八事件史料、台灣人權運動史料。	嘉義地區二二八事件相關史料及鄉土文物。	阮朝日生平文物及遇害資料文件；二二八事件後消失的媒體與新聞人；屏東地區的二二八事件；水上機場死難者出土遺物以及受難者家屬提供的受難者文物等。	述說高雄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始末、事後的綏靖清鄉與影響等情形；並搭配相關文物與受難者遺物展示，希望以平和、明朗的調性，突顯「高雄二二八事件」的特殊性、爭議性及其歷史意義。
------	-------------------	---------------------	--	---

從以上資料，台灣二二八相關之紀念館名稱，多以地方為名，除了彰顯並且區別二二八事件在台灣各地之不同發展外，也說明了這些紀念館之設立乃以地方政府主導，並結合民間團體及受難家屬之力量籌建。雖然並非每一個紀念館均為民進黨執政之縣市長任內所籌設的，然而二二八紀念館卻常常與綠色執政畫上等號。之所以如此，固然與民進黨在解嚴前後持續進行民主改革運動相關，而陳水扁擔任台北市市長任內，先後於一九九六年及一九九七年更改台北市新公園為台北二二八紀念公園，並推動台北二二八紀念館之設立，讓許多民眾，尤其是受難家屬將台北二二八紀念館視為民進黨之政績。此外，在展示設計上，台北二二八紀念館的常設展以文獻、圖片、照片及文物等，來架構並且敘述二二八事件前後之台灣社會政治背景及二二八事件之發展始末。在敘事觀點上，該常設展採取兩種敘事觀點，一是以事件發生前後，生活在台灣之一般人民之觀點，描述其於日據時代生為殖民地人民之不滿與悲哀，及目睹國民政府遷台時種種作為所引發的憤憤不平與衝突；一是事件發生後，以受難家屬之觀點來回憶家

人失蹤或受害之過程。而連接這些觀點與造成這些經驗與悲劇的關鍵則是認同問題，因此在一樓入口處，即以非常大的說明牌寫著：「認同的迷網 造成悲劇 烙印在島國的土地」，直接將二二八事件與台灣民眾之認同議題作一關連。採取這兩者敘事觀點，有效地引發台灣人之認同，並令觀眾感受到受難家屬之傷痛，而引發感同身受之情感；因為事件發生在台灣這塊土地上，不少觀眾或者曾經親身經歷過，或者曾聽長輩描述，因此感受自然比美國人參觀猶太浩劫紀念館來的密切，甚至引發其政治認同及實踐。

值得一提的是，整個敘事觀點以台灣人與受難家屬的經驗為核心，而外省人或者原住民的觀點與經驗則被忽略。換句話說，剛移民到台灣的外省人是如何經歷這個事件，他們眼裡的二二八事件為何，則很少被討論，也因此很難引起他們的認同。除了二二八事件之陳述外，紀念館更於二樓設有「白色恐怖」與「公義和平運動」展廳，將二二八事件連結到白色恐怖及黨外之民主抗爭運動，使得台北二二八紀念館，不論在設立過程或展示與敘事內容，都讓人與民進黨之政治理念與執政產生了緊密地聯想，而這樣的聯想與依附情結尤以義工的感受最為深刻。特別要說明的是，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從籌設之初，即與受難家屬有著很深的互動。受難家屬不但是文物的提供者，也成為義工團隊之重要組成成員，對台北二二八紀念館的經營管理，往往扮演著具影響力的角色。

此外，台北二二八紀念館也是台北市第一個公辦民營的博物館，從創辦到二〇〇〇年中，由親緣的台灣和平基金會經營，其常設展之建立與文物典藏徵集皆在其手中建立，並奠定了目前館務運作的基礎。然而，當一九九八年台北市由國民黨馬英九贏得選舉擔任市長以後，經營權也轉交由泛藍的台灣區域發展研究院接手管理。這樣的轉手經營，也引起了各種質疑聲浪，特別是來自受難家屬及義工團隊的各種質疑與不滿，認為台北二二八紀念館正逐漸朝向去二二八的方向經營與策展。這種不滿與緊張的關係，在二〇〇三年由台北市文化局

接手直接經營後，並沒有因此而減緩。面對這樣的質疑，二二八紀念館館長謝英從表示，二二八紀念館並不限於只舉辦二二八相關活動及展覽，因此曾舉辦過歷史與文化相關主題的展覽，但該館持續針對二二八史料舉辦專題展，以展現對二二八史實的尊重與誠意（民生報 2006）。而第一座國家二二八紀念館即在各方呼籲下，於二〇〇七年二二八事件六十週年之際選定日治時期台灣教育館（前美國文化中心），以特展「斷裂與再生」揭牌。至此，台灣始擁有第一個國立二二八紀念館。

從台北二二八紀念館之案例可以發現，二二八紀念館之設立有其特殊之社會與政治背景。若無解嚴後的政治環境生態，加上各個相關受難家屬等人權團體之支持，二二八紀念館也不可能設立。然而正因其性質之特殊性，不同關係團體之看法與支持相互影響館務運作，並且牽動著未來之發展方向。相對而言，一般觀眾的經驗與想法，則似乎顯得相當邊緣而很少被聽到。到底他們是怎麼看待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及其呈現之二二八事件？而在這個充滿創傷經驗的場域中，他們的經驗與感受又為何？以下將分類整理館方所蒐集之觀眾的留言條，以進一步瞭解觀眾在台北二二八紀念館之經驗與感想。

創傷、集體記憶與認同：觀眾經驗與感想

台北二二八紀念館除常設展與特展區外，於二樓常設展出口處，設有觀眾留言區，一方面供觀眾在經歷過相當悲慟、光線與色調均相當暗淡之歷史展示區後，得以在擁有大片玻璃落地窗、面向廣場之區域休憩、冥想；另一方面也提供便條紙與留言板，供他們抒發己見。館方則定時蒐集這些留言條，並且整理部分內容刊登在館刊「和平鴿」上。然而受限於版面，館方只能選取相當少數的留言內容刊登，也無法將之系統化地分析與歸類。因此，本研究獲得台北二二八紀念館之支持，提供所收集之歷年留言條，供研究者進一步整理、歸類與分析。

爲了兼顧留言內容之真確性及留言觀眾的隱私，除了以全名留言者，研究者將其名字以 XX 代替之，其餘將以留言之原始內容及署名呈現之。分析整理發現觀眾之留言內容約可分爲以下五大類：

一、對受難家屬或受難者之感言

包含對受難家屬致敬與受難家屬自身感言。如：

228 事件爲我們帶來了震撼，誰不希望有和平存在，這些悲痛已成過去，爲台灣犧牲的勇士們，「我們以你們爲榮」台灣加油！（三峽國中周 XX 95.2.28）

因爲前人種樹後人才能乘涼，雖然爲了種樹的代價太大了，但是因爲他們才有今天民主的台灣，謝謝你們！加油！（Candoue 93.12.22）

台灣一定要加油！身爲 228 家屬~很感謝收集這些資料的大家，謝謝！我愛台灣，拿出臺灣人努力不懈的精神。（94.5.13）

除了對先人犧牲之敬佩與哀悼，受難家屬則帶著創傷與回憶來到這裡，悼念親人並且爲他們及台灣祈福。

我帶著思念的心，頭一次來看祖父身亡的歷史，我帶著三歲十個月的女兒，來看阿祖的儀容和阿祖的同仁，我的親人我的朋友我的台灣人，希望這場不該屬於我們的眼淚，隨著時間拌入歷史，刻在心坎裡，我愛您，台灣！（91.12.14）

我看過 228 事件在北港溪，當時我哭了（才 7 歲，心痛）。希望 228 事件往生者趕快離苦得樂，或到西方極樂世界……您們是此心中永遠敬佩的人，偉大、難忘。（台北退休老師 91.8.30）

先是殺「阿山」，全省火燎原；隔海派軍來，報仇又「平亂」。同

胞互廝殺，悔恨到何年？（海外歸人憶往，三官留筆 93.8.15）

對於受難家屬及目擊者而言，參觀紀念館本身即是充滿哀悼與回憶的經驗，看到自己的親人遺容在博物館中展示，一方面既感到無限哀思，另一方面則帶來了撫慰傷痛的力量。

二、學習及教育之反思

包含快樂的學習經驗及對學校教育的反思。例如：

我很喜歡這個地方，她讓我學到有關台灣的东西。（高雄馬禮遜美國學校 林 XX 91.11.3）

我愛台灣，很棒的呈現，可以讓我們了解許多課本上沒有的事實。（F.J.U. C.F.S. 司 2005）

終於讓我看清楚歷史的真相，我是軍校畢業，長期接受國黨教育，蒙蔽了許多的見識，如大夢初醒。願歷史原貌真實呈現，公平正義得以伸張。台灣加油！雄 XX（93.12.28）（另有人在留言上回覆「你被另一個意識型態騙了」）

在這類型的留言中，可以發現有些觀眾是帶著追求新知的喜悅來學習的，然而也有些觀眾會進一步思考、比較過去在學校教科書所學的，與博物館所提供之歷史教材有著不小的差異，因而感覺受到欺騙了。

三、對歷史創傷的詮釋與反應

這類型留言包含忘記過去傷痛及記取歷史教訓等兩極不同之反應，及延伸對台灣現在、過去與未來之期許。

在這類型的反應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對於二二八事件恐懼與害怕的反應，尤其以兒童的感受更是格外的深刻。

看了那麼多東西後，我只能說慘不忍睹啊！看了以後覺得很難過，台灣的人真可憐，228 事件真是恐怖！（小風 91.11.2）

我覺得今天看的東西真可怕，尤其是以前的人，可不可以不要放這麼可怕的嗎？我晚上和以後都會被嚇死。以後也不敢來了。（兒童字跡 Eva 91.8.28）

面對這樣的創傷經驗，觀眾則有不同的反應及想法。有的觀眾認為遺忘傷痛是最好的方法：

沉痛的過去讓他停留，不帶走。（91.5.25）

228 事件到現在已好幾年了，它造成了許多震撼和悲痛，到現在依然無法忘懷，但是現在的我們是該放下悲痛，勇敢的迎向未來，願未來不再有悲痛，只有和諧！（93.11.19）

或者是強調以寬容與愛來化解悲痛，其中有不少留言明顯地是懷著宗教情懷，而也有民眾因為擔心族群問題，呼籲以大愛來化解傷痛。例如：

我們應該更深刻體認大家必須要什麼樣的教育，心中惟有充滿慈悲才能淨化人心，懷著宇宙生命同體，我們方能超脫所有戰爭及亂象。（2002.6.16）

台灣人、中國人、什麼人，本是同根生，建請用大愛為人生小島共同奮鬥。（文義、秀美、孟軒、和謙 91.8.25）

但是，也有相當多的觀眾，認為我們不但不應該遺忘，而需要積極記得教訓，不再重蹈覆轍：

希望不要再有這蠻橫無道的作法了，過去的教訓我們要永遠記在

心裡，不要再重蹈覆轍。(91.9.14)

本來只是要來做報告，可是真的看到了很多，眼前所看到的一切……如今知道台灣有這樣慘痛的過去，我們就更應該記取教訓，勿重蹈覆轍。(明倫 小玉、大姊、Fish、小白、小步、丸子 94.12.11)

願 228 的傷痛能隨歷史的軌跡漸漸撫平，而今日我們也應記取教訓，以歷史替代和平，不再有本省、外省的鴻溝。(94.8.6)

對於歷史教訓的反思，也引起對省籍問題的反省。最後，不少觀眾因了解歷史悲劇，而引發對現在珍惜與惜福之情，例如：

走過冬天，才知春天的美好，經歷過歷史的傷痛，而對現在珍惜！（95.1.14）

今天來參觀 228 和平紀念館，才發現 228 事件是如此辛酸、難過的一段歷史，從今後要更珍惜現在幸福的生活！為受害者哀悼……（2004.10.9）

傷痛可以是力量！沒有震撼、悲傷的過去，不會珍惜現在的一切，忘卻傷痛，迎向未來！台灣加油、世界和平。(中山女中 賴 XX 93.10.3)

四、政治性與情緒性之感言

這類型留言以口號類比例最高，而情緒性、政治性評論，甚至對二二八事件誤解者也不在少數。如台灣加油、和平萬歲等口號類，常見於各類型留言中。其中較值得觀察的是情緒性、政治性的評論。此類留言中，可以看到部分觀眾極端憤怒之情，溢於言表：

28 事件，終歸是陳儀的罪。殺無赦：下 18 層地獄啊！（憤

怒的阿桑筆)

只有受害者有資格說「向前看，我們忘了過去吧！」加害者沒資格。(95.6.13)

蔣 XX 實在太可惡，陳 X 也是，通通去死吧！PS.他們好像已經死了ㄟ……。(不名人士 91.6.1)

臺灣人好討厭！沒教養，動不動就罵人！！你們又多好了！憑什麼罵日本人！！(日人上 91.9.29)(此文後來被人將台灣人與日本人異位，並加上一個「幹」字)

從這些留言中，不但可以看到民眾對政治人物的嚴厲批評，有時甚而演變成不同族群之間的謾罵。此外，也有一些觀眾，藉此作一些政治性的評論：

希望台灣人民永遠記得今天這一切得之不易，我們不要外來政權的統治，我們要做自己的主人。(良心 94.12.21)

發生 228 事情的年代我仍未出世，但這可讓我們了解民主自由的可貴，但「法制」亦應提出以彰顯「公義」，現在的執政者，你做到了嗎？(J.J. 94.4.7)

我們都是台灣長大的人民，為什麼台灣不能獨立？是誰造成？(94.12.29)

在這些交雜政治性與情緒性的評論中，也有很多觀眾對二二八事件的理解是錯誤的，最常見的錯誤是將二二八事件視為日本人對台灣人的迫害，如：

發生這個事件後讓我覺得很害怕，雖然我很討厭日本人，但

是也有台灣很多建設，希望不要再發生這些事了~可怕、真悲傷。
(91.2.14)

看完 228 的歷史之後，感想真的很多很多……日本人真是太可惡了，台灣人寶貴的生命都被這些劊子手給殘害了~日本人的心真是黑到極點~（永遠也無法抹滅）！想到現在有很多人還盲目的哈日……唉~希望他們都能來這看看，以前的祖先是怎麼的付出，用什麼來換這美麗的台灣！！（91.11.6）

現今我們所擁有的一切，希望大家能夠好好的珍惜！〈※殺我同胞者是大陸，切勿混淆於日本~〉228（台北縣立樹人女子家商 商科 2 仁班 7.15.29.32 之感言 91.11.16）

誤解二二八事件為日本人對台灣的迫害，在二〇〇二年的留言較多，最近一、兩年則較少出現；可能是因為媒體相關報導越來越普遍，民眾對於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背景似乎也比較了解。

五、其它反應者

包含對館方之建議及其它無法歸類者。

究竟死了多少人？請基金會在館內設板公告，以釋群疑（大學教授 95.3.24）

美麗之島蒙此血腥事件，我愛和平亦愛真理，展覽中我看不到反省與悔悟（95.3.7）

歷史是多面的，在這裡我看到了印象深刻的一面，只是一面，請留意全面，才能和平（上海老人 95.1.7）

希望能有一些比較動態的東西，瀏覽起來比較不乏味。
(91.7.23)

紀念館請擴大報導日本人在台的暴虐事件史實。(2005.9.10)

事件應增加更深入的探討？當時環境介紹，每個犧牲者的背景等證據收集，而非止於表面事件的敘述？(2005.10.30)

紀念館的意義應該是追憶史實，避免再犯，教育意涵大於衝突對立，過分較勁的結果，受傷的仍是土地，受害者還是我們。
(漢林 94.9.10)

從以上觀眾對於館方批判性的建議，可以看出不少觀眾憂心台灣目前族群對立的狀況，因而希望館方的展示能夠更具包容性與教育性。這些看似簡短的評論與意見，往往帶給博物館界不少思考與反省的空間。

另外，本研究也依目前所蒐集到的留言條，依年度（二〇〇二、二〇〇四、二〇〇五、及二〇〇六）整理各類留言分類之百分比如下表：

表二 觀眾留言分類比例表

	2002		2004		2005		2006~7月	
一、與受難家屬相關感言								
給 給受難者及家屬感言	37	9.32	20	9.62	71	7.91	41	6.44
受 受難家屬及經歷者心情	2	0.5	0	0	2	0.22	1	0.16
二、學習與教育								
好玩、新鮮、學歷史	25	6.3	6	2.88	25	2.75	2	0.31
學校教育之欺騙與落差	12	3.02	5	2.4	18	1.98	6	0.94
三、對歷史創傷之詮釋與反應								
創傷與恐懼經驗	40	10.08	18	8.65	26	2.86	18	2.83
忘記過去、忘記傷痛	13	3.27	15	7.21	22	2.42	26	4.08
寬容與愛	4	1	3	1.44	40	4.4	21	3.3
記取歷史教訓 悲劇不要重演	41	10.33	53	25.49	184	20.22	115	18.05
珍惜現在 創造美好未來	25	6.3	34	16.35	94	10.33	68	10.68
四、政治性與情緒性之感言								
口號類	1 117	29.47	18	8.65	235	25.81	189	29.67
政治性評論	30	7.56	29	13.95	129	14.17	115	18.05
情緒性話語	6	1.51	0	0	6	0.66	6	0.94
對 228 的誤解	17	4.28	0	0	6	0.66	2	0.31
其它反應者								
給館方的感想與建議	14	3.53	1	0.48	23	2.53	10	1.57
其他感言	14	3.53	6	2.88	28	3.08	17	2.67
留言總和數	397	100%	208	100%	910	100%	647	100%

從以上之留言摘要及年度比例，也可以發現觀眾對於二二八事件有著種種不同之解讀。除了一般性對歷史之感懷與對受難者致意外，不少觀眾的留言顯示參觀二二八紀念館是一充滿哀傷與悼念之歷程，因此經常可見“太恐怖了”之類的感受，但多數人仍然強調走出悲情、走出傷痛並且期待台灣未來會更好。從年度留言比例中可以發現相當高比例的觀眾，在面對歷史悲劇時，會將其轉化，以尋求積極的意義，最常見的反應為記取歷史教訓並且希望悲劇不要再重演，顯示一般民眾大都能夠以成熟的思考去面對反思此一傷痛的歷史事件。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對於年紀尚輕的兒童而言，參觀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帶給他們的經驗經常是充滿恐怖與驚嚇的，他們也無法從這麼恐怖的經驗中尋找正面性的理解與意義。因此，館方或者應設定參觀年齡限制，或者參考美國猶太浩劫紀念館的作法，增設專為兒童設立的展區，以兒童的觀點來敘述整個事件，並注意文物與相關照片的使用，也要符合兒童的心智年齡以及教育內涵之傳達，避免展示情緒過於強烈或太過悲慘的展品，以防兒童在未能充分理解歷史悲劇之原因與意義時，對他們的心靈產生不可抹滅的創傷。

在學習經驗方面，陳佳利（Chen 2003b）從成人學習及轉化學習理論（Transformation Theory）的觀點探討成人觀眾在台北二二八紀念館的學習經驗，指出一般觀眾的反應可以分為獲得資訊、比較與先備知識之異同，並且轉化形成新的知識。如果博物館的訊息與既有的知識吻合，那麼他的認知與對事件的瞭解則會加強。但是相反地，如果其既有的知識與博物館所提供的資訊相抵觸，觀眾則會形成兩種極端的反應：一則強烈質疑既有的知識，對學校教育產生強烈的懷疑，並且轉化於博物館所獲得的資訊，形成新的知識體系。另一極端反應則強烈質疑博物館之可信度，或者乾脆以自己的角度來參觀，完全漠視博物館所提供的資訊。

此外，對於二二八事件之理解與詮釋，一直與台灣政治現況及國

族認同有著強烈的關連，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何有非常高比例留言為政治性及口號類。在政治性評論方面，不意外地，觀眾也透過對二二八事件之理解，呈現出加強台灣認同與中國認同之兩種截然不同的反應；但也有人希望悼念二二八事件之際，提醒館方不要將其利用作為挑起族群情結。而種種留言中，最令人詫異且啼笑皆非的反應恐怕是對二二八事件之誤讀，其中最常見的誤解是將其視為日本人對台灣人之屠殺，顯見觀眾是帶著自己的觀點來參觀，幾乎沒有受到館方展覽內容影響，以至造成對歷史事件之錯誤解讀。正如同佛洛伊德對於過失心理學的研究指出「語誤的結果可以視為一種有目的的心理歷程」（葉頌濤譯 1988：45），而讀誤則往往因為對於所閱讀的內容極端厭惡所產生，並且以完全替代的形式出現。這或許可以說明為什麼少部分觀眾會出現完全的誤讀，反應出對於二二八事件史實之強烈排斥，並以曾經殖民統治台灣的日本人為口誅筆伐的對象，認為他們才應該負起台灣所有災難與不幸之責任。

Falk & Dierking (2000) 對博物館觀察研究發現，觀眾是帶著個人的經驗與理解來參觀博物館，並受博物館環境與社會脈絡所影響；然而在台北二二八紀念館這樣特殊的場域裡，觀眾的參觀經驗除了受先備知識與記憶之影響，也往往與當下之政局與社會現象產生連結與對話，呈現出多元、歧義之觀點。我們無法清楚得知這樣歧義的多元觀點並陳於留言版時帶給其他觀眾怎樣的經驗與感受，是贊同、理解或反對？對於前者，我們無法獲知，然而對於後者，有些觀眾會留言回應其他人的意見，甚至直接修改、辱罵所不贊同之留言，顯見各種對話與衝突也正在此靜悄悄的角落裡上演著。

結論：朝向交互主體性之博物館敘事與觀眾經驗

李昂 (2002) 轉述日本暢銷小說家吉本芭娜娜的演講內容提到：「生命像是一個療傷的過程」(8)。而面對國家社會集體創傷，博物

館帶給觀眾的究竟是一場怎樣的旅行？是加深創痛或是讓觀眾展開一場治癒之旅？本研究首先回顧猶太浩劫紀念館於美國及以色列成立之背景，並分析對猶太浩劫之解讀會隨其國內外政治變化，而產生不同的詮釋，以達到不同的文化認同與政治實踐。在這樣的脈絡下，本研究以台北二二八紀念館為個案研究，指出二二八紀念館如何於後解嚴台灣政治社會環境下，由地方政治及不同團體交互影響下所建構，並與台灣目前政治社會生態及文化認同產生重要互動；而透過觀眾留言條之分析，也呈現出觀眾多元，歧義甚至相互衝突的意見與感想。

作為一個文化機構，博物館將歷史事件，以文物、照片、模型及敘事加以再現與敘事，而這樣的再現與敘事一方面提供觀眾連接及了解過去之可能，然而也使得曾經發生過的歷史事件得以重複地被觀眾再經歷，而形成集體的創傷與記憶。本文運用精神分析之理論，討論災難紀念型博物館所建構之創傷時間，於其中，多數民眾經歷了虛擬的體驗、詮釋與重複的過程。以台北二二八紀念館為例，對許多觀眾而言，雖然未曾親身經歷災難或事件本身，然而館方所提供的敘事、文物展示與詮釋，重構了二二八事件，使得觀眾雖然是虛擬地經歷二二八事件，然而卻構成其創傷經驗，這個從不少觀眾的傷痛反應可以得知一、二。

對於曾經親身經驗二二八事件的觀眾而言，參觀紀念館則提供他們一個再體驗並且尋找、詮釋事件意義之可能性。在這個過程中，除了部分觀眾希望全然忘卻創傷經驗外，許多觀眾嘗試以記取歷史教訓作為其解讀歷史悲劇之意義。再者，面對台灣社會之集體創傷，也有不少觀眾與台灣社會現況產生連結，產生對台灣或中國認同之再加強、或憂心族群融合等反應。慶幸地，不少觀眾希望過去的創傷不要成為族群對立的根源，並且發展出更加惜福與珍惜現在的態度。

然而，除了上述反應外，在這個充滿創傷與歷史記憶的場域中，博物館所重構之歷史悲劇也不斷地與觀眾個人的認知與經驗產生對

話或衝突，但是這樣的對話與衝突，並不一定都會成功地轉化成為型塑社會之共同集體記憶、認同與力量，如以色列之案例顯示。分析二二八紀念館的留言，則說明了對二二八事件的不同解讀，仍構成台灣社會族群間互動，乃至國家認同之重要變數。雖然多元、歧義與衝突原本就是博物館這個自由學習之場域所應有的現象，然而博物館真的協助觀眾以更多元的觀點來反思歷史事件嗎？我們是否提供足夠的思考空間，讓不同族群在這場歷史悲劇中的經歷與感受都能夠被呈現與詮釋、進而交流、相互理解而達到互為主體性？還是各持己見，讓社會的集體創傷日益擴大？博物館如何在呈現歷史事件外，促進一個具反省力、包容性之道德社會，以朝向建構更多元的博物館敘事，並促進互為主體性之觀眾經驗，或許這正是博物館社群所要深刻思考的內涵。

參考書目

- 王明珂 1993 集體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 當代 91：6-19。
- 民生報 2006 《228》紀念館去 228 化？館長說明作為與誠意 民生報 2 月 28 日報導：[http：//www.udn.com/2006/2/28/NEWS/READING/REA8/3187072.shtml](http://www.udn.com/2006/2/28/NEWS/READING/REA8/3187072.shtml) 網路新聞擷取日：2005 年 8 月 16 日。
- 沈志中 2004 解構事件與 911 創傷當代 207：42-55。
- 汪文聖 1999 創傷的記憶或遺忘？——一個時間現象學的探討。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 5：77-100。
- 李昂 2000 生命是一段療傷的過程 收錄於 身體都知道 吉本芭娜娜 原著 陳寶蓮譯 台北：時報出版社。
- 陳淑惠、林耀盛、洪福建 & 曾旭民 2000 九二一震災受創者社會心理反應之分析——兼論「變」與「不變」間的心理社會文化意涵 中大社會文化學報 10：35-60。

- 張小虹 2002 看不見九二一：災難、創傷與視覺消費 中外文學 30(8): 83-131。
- 張譽騰 2003 博物館大勢觀察 台北：五觀出版社。
- 謝金蓉 1997 一座座的二二八紀念碑，代表解讀歷史的不同窗口 新聞 521： 75-77。

翻譯文獻

- Connerton, P. 納日碧力戈 譯 2000 社會如何記憶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Freud, S. 葉頌濤譯 1988 精神分析引論 精神分析導論(二冊合訂本) 台北：志文出版社。
- Sontag, S. 陳耀成 譯 2004 旁觀他人之痛苦 台北：麥田。

英文書目

- Chen, C-L. 2003a. Learning, Recollection And Connection: A Study of Cultural Identities amongst Visitors to Local Museums in Taiwan. Unpublished Doctoral Thesis. Department of Museum Studies,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 Chen, C-L. 2003b. Interpreting History: Adults' Learning in the Taipei 228 Memorial Museum, *Museological Review*, 9: 16-29.
- Crane, S. A. 2006. The Conundrum of Ephemerality: Time, Memory, and Museums. in *A Companion to Museum Studies*. ed. Sharon Macdonald.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ing, pp.98-109.
- Crysler, C. & Kusno, K. 1997. Angels in the Temple: The Aesthetic Construction of Citizenship at the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Art Journal*, 56 (1): 52-64.
- Falk, J. H. & Dierking, L. D. 2000. *Learning from Museums*. Oxford:

- Altamira Press.
- Foote, K. E. 1988. Object as memory: The material foundations of human semiosis. *Semiotica*, 69 (3/4), 243-268.
- Friedländer, S. 1994. "Memory of the Shoah in Israel: Symbols, Rituals, and Ideological Polarization" in *The Art of Memory: Holocaust Memorials in History*. ed. James E. Young. N.Y.: The Jewish Museum, pp. 149-157.
- Fyfe, G. & Macdonald, S. ed. 1996. *Theorizing Museums*.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ers.
- Halbwachs, Maurice. 1980. *The Collective Memory*. Translated by Francis J. Ditter, Jr. and Vida Yazdi Ditter. New York: Harper Colophon Books.
- Hein, G. 1998. *Learning in the Museum*. London: Routledge.
- Hooper-Greenhill, E., and Moussouri, T. 2000. *Making Meaning in Art Museum 1: Visitors Interpretive Strategies at Wolverhampton Art Gallery: Research Centre For Museums And Galleries*.
- Hooper-Greenhill, E., and Moussouri, T. 2001. *Making Meaning in Art Museums 2: Visitors' Interpretive Strategies at Nottingham Castle Museum And Art Gallery*. Leicester: Research Centre for Museums And Galleries.
- Huysen, A. 1993. Monuments and Memory in a Postmodern Age. *Yale Journal of Criticism* 6 (2): 249-61.
- Koonz, A. Claudia . 1994. Germany's Buchenwald: Whose Shrine? Whose Memory? in *The Art of Memory: Holocaust Memorials in History*. ed. James E. Young. N.Y.: The Jewish Museum, pp. 111-119.
- Landsberg, A. 1997. America, the Holocaust, and the Mass Culture of Memory: Toward a Radical Politics of Empathy. *New German Critique* 71: 63-86.

- Macdonald, S. 2005. Accessing Audiences: Visiting Visitor Books. *Museum And Society* 3 (3): 1-18.
- McNally, R. J. 2003. *Remembering Trauma*.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Novick, P. 1994. Holocaust Memory in America. in *The Art of Memory: Holocaust Memorials in History*. ed. James E. Young. N.Y.: The Jewish Museum, pp. 159-165.
- Nytagadien, R.L. & Neal, A.G. 2004. Confronting an Ugly Past.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Culture* 27 (4): 375-383.
- Urry, J. 1996. “ How Societies Remember the Past” in *Theorizing Museums*. ed. Fyfe, G. & Macdonald, S.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ers, pp. 45-65.
- Young, James E. 1994. The Art of Memory: Holocaust Memorials in History. in *The Art of Memory: Holocaust Memorials in History*. ed. James E. Young. N.Y.: The Jewish Museum, pp.19-38.
- Zolberg, V. 1996. Museums as Contested sites of Remembrance: the Enola Gay Affair. in *Theorizing Museums*. eds. Fyfe, G. & Macdonald, S.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ers, pp.69-82.

